
* 教育经济学导论 *
* * * * *

M·布劳格

上 册

~~~~~ 杭州大学教育系 ~~~~~

# 教学经济学概论

布劳格著

## 编者前言

布劳格教授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这是一本教科书，它系统地汇集了一切和教育政策有关（或应该有关）的不同的经济方面的考虑。教育学家都将采用它作教科书。不仅教育经济学的学生，还有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的学生都将在这本书中发见新鲜的分析见解和与经济增长以及与人才的有效的使用有关的无数政策方面的考虑。所有“福利经济学”的学生都将发现他们对许多争论以及方法论由于读了这本书而加深理解。

但是，在称这是一本教科书时，布劳格教授可能冒着只有那些修习正规教育课程的人会读这本书的危险。特别是对教育政策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大的不幸，有些教育家对于他们的活动应该按照经济学家的准则进行评价的建议曾有强烈反应，但是多数人现在承认这种评价是恰当的。诚然，很多教育学家把他们扩张教育或实行某种教育制度和结构的理由寄托在教育与诸如增长率和对技术变革的适应等经济因素的关系上。布劳格教授关心的是这种关系，特别是经济规划的问题，教育决策者的“传统才智”的原则受到批判考察，说明有些原则是没有根据的，不可信的，或是明显错误的。

布劳格教授的长处之一是他集中注意经济并没有使他对教育，

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心理学的重要性熟视无睹，也没有发展个人的和社会的价值判断必须影响决策的程度。有鉴于决策者和管理人员所能影响的教育制度的投入大部分可以进行经济的分析，同时教育制度的一大部分的产出也具有经济的性质，教育政策必须不止于关心这些经济投入和产生出之间的平衡，虽然布劳格教授帮助我们几个新的角度考虑投入和产出的平衡，他并未忽略更为广泛的问题。

特别有兴趣的是关于教育设施的结构与劳动力供应对劳动力需求模式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关于美、英两国教育和经济的比较颇有启发性，对这些有关的问题的讨论对于当前讨论中若干主要教育政策问题有着很直接的关系。这仅仅是用丰富的实例来阐明分析的一个例子，而这种分析乃是本书的核心。有关印度、非洲、美国和英国的教育问题的详尽讨论和对正在应用或建议的政策尖锐的批评，不仅给予读者教育经济学的知识，还有对比较教育政策的有价值的论述。

布劳格教授谦虚地把他的教科书区别于科学研究。要反驳这个观点需要对科学研究的几种定义作简短的探索，这里并非进行这种探索的地方。但是，免有读者误解，我可以十分明确地说，这是一本真正学术性的和创见的著作。全书论述活泼，新颖而且有刺激有刺激的作用。这本书是写来打响教育政策的，十分肯定，读者的思想将会得到澄清、改变和扩展。

(王承绪译)

肖伯纳的箴言：“能者干，不能者教”早已被改为“能者干，不能者教，不能教者搞科研”。现在似乎必须再加修正，改为：“能者干，不能者教，不能教者搞科研，所有这些都不能者写教科书”。写这本陶尼曾称之为“那个令人厌恶的混血儿”的教育经济学教科书，已经给我某种快乐，而我最大的希望是给读者同样的快乐，不管他是谁。

但是，公平的讲，我心目中有着特殊的读者。这本书假定无需先具有初等经济学以外的经济学知识：所有初等经济学以外的知识在我们行文中随时加以解释。偶而引用一些统计概念，但是如果把它们略去也很少损失。总之，这本书是对大学本科生讲的，甚至高级水平经济学成绩优良的中学六年级生也不会有什么不懂的东西。大学研究生也可能觉得这本书有些用处，但是只是在他们经济学的教育被忽视的时候，那当然是经常发生的事。真的，关于教育经济学，令人惊异的是这门课总要吸收一些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如边际替代，机会成本，存量与流量的区别，折扣，制约最大化等等。我们无需懂得很多经济学，把它应用于教育，但是我们知道的那一点儿必须透澈。

本书提到的书籍，我从中选用了一些文章和节录，编成两卷《教育经济学文选》，列入企鹅近代经济学文选丛刊出版。这些读物在本书各章用“\*”另标明。

我要感谢雷那俭和吴德霍尔二人，他们通读全书，提出很多宝贵建议。我也要对我妻子露西表示感谢，她认为能够提高本书

质量，结果也确实做到了。最后，我想感谢布荷达为我写好打字稿。

(王承绪译)

教育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这一点值得讲明，因为这门学科有时被认为局限于诸如学校的费用和筹措资金等问题。这些当然构成这门学科的许多方面。但是教育经济学并不止于此：它基本上研究教育对劳动力的职业结构的影响，雇主的招工和提职的办法，一国之内地区间和不同国家间劳动力的流动、国际贸易的模式，个人收入的大小分配、节省流动收入的倾向，以及经济增长的前景这个最普遍的问题。通常，它的主要目的是描述和解释，但是，有时它寻找规定和建议；教育制度几乎到处都属国家所有和由国家实施，问题自然产生，经济学家能否提供教育投资标准，正如他对其它公共性部门不适当规模和组成发表意见一样。这是教育规划的领域，是经济学家过去十年中几乎和他们在一般经济规划方面一样激烈战斗的活动领域。

新学科的定义刚写出就过时了。“经济学是经济学家干的事情”，这里我不想尝试把教育经济学之全称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很容易看到，教育经济学在若干问题上难以宽察地变成劳动经济学、公共事业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只是当教育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成为争论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时，教育经济学才表现出它自己，否则就象平常的经济分析一样。把教育经济学打成它一块的是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在近代经济中，受教育，为各个人提供为自己投资的机会；防务经费不同和公共教育经费，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竞选时间以外的时间个人选择的结果，这些个人的决定受到所期望的经济收益的深刻影响。这就对

各个人教育所需要的经济分析和制订集体提供教育设施的经济标准打开了门。正是这点认识从开始就激励了这门学科，并仍继续推动着这个领域的研究。有一位作者曾经称之为“经济思想中的人力投资革命”，这是五十年代后期的一个现象，直到今天构成教育经济学存在的理由。

当然，教育只是人的投资的一种形式。人们可以通过支付医护迁移到比较繁荣的地区，购买工作机会和职业前景的情报、以及选择也具有较高训练内容的职业，对自己进行投资。在这种程度上，教育经济学进入已经被夸大地称作“人力资源经济学”的广泛得多的学科之中。本书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这些较为广泛的问题。但是在这样一本概论中最好把课题范围限制在比较小的范围，比较清楚的教育领域。但是，我们讨论的范围的确超出学校提供的正规教育：劳动训练、成人教育和农业推广等形式的校外教育非常重要，不能完全不讲。

但是，除教育的投资方面以外，教育制度作为工业（是否真正可以称之为工业）来考虑，从它的特点，本身就有理由进行特殊的经济学研究。首先，它寻求多重目标，其中没有一个包括最大限度的利润或任何接近利润。第二，它有一个特别长的生产周期；使它必先于需求建设大部分教育设施。第三，它以相当刻板的专工技术进行，大部分是通过习惯和传统自己强加的。第四，它以管理的价格而不是市场决定的价值购买大部分投入，并且把它自己产出的绝大部分作为随后的投入进行反馈。所有这些特征可以归结为：（a）一个僵硬的生产结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相对因素要稀缺的影响；（b）产出流量的明显中断，这是几个几乎保证在有关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产生长期不平衡状况的联合体，在多数国家经常关心所设

“人力缺”和“人力过剩”现象。这里显然是一个肥沃的领域可以进行过去二三十年来发展起来的系统的预约规划，运筹学研究、成本效益分析和所有其他工具来改进非市场活动的管理。这里有许多非心设计的，破坏经济学家计划的麻烦问题：如果工业为经济的其余部门培养熟练的人力几乎肯定进行无效，那末经济学科中所盛赞的竞争标价制度的最优化效果变得怎样了呢？

教育经济学是一门“幼稚工业”，前文所挖出的许多问题现在甚至仅仅开始解决。这门学科的确切内容和实质性的核心仍有争论，就是说在这个领域中没有两位专家对现时各种研究结果的相对意义或者甚至对这本概论中论述各种思想的适当次序看法完全一致。本书的中心是教育规划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政策方面构成教育经济学的最高目标。但是今天在教育决策者中间广泛同意教育上的决定应该重视教育的经济价值和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是怎样重视？这就是本书的内容。

但是研究教育的经济价值，并不是要求优先考虑经济目的，或者赞成教育的职业目的；而是承认事物怎样就怎样！无论如何，事先和家长对连续的教育资历所开拓的就业机会具有浓厚的兴趣，同时全世界的教育当局都被说服经济增长能够通过鼓励教育而加速，并不是教育的纯粹教育，社会和政治的目的有被忽视的危险。相反，真正的危险是只有当经济的论据和更多、更好地进行教育所有其他好的理由一致时，才获得发言的机会。学生和教师在当前的争论中毫不注意高等教育财政来源和模式足够轻视我们，经济学家对于教育的主题过分温和而不是过分强调。

没有一个国家推行教育制度仅仅为了达到经济的目标，我不知道有哪一位经济学家首先提倡过追求这样一个真诚的政策。但是，



即使有这样一位经济学家，他建议的分量并不比任何别的公民的建议更重。哎呀，经济学家确作价值判断，但是他们并无价值判断的权利——根据教育强度达到职业的或其他目的的效果对它进行评价，很好；表达对职业目的的伪爱，不对。谈论“是”和“应该”就象东西两方永远不能相遇。价值观念或常模不能逻辑地从事实得出来；它们可以用合理的论据来证明，但是它们不能象陈述事实那样受人际示范的影响。某些科学哲学家认为，所有规范的争论，当化为最后的成分时，就分解为关于积极影响的争论。一切附有说明的事实经验以主张只能用科学的严密性的特有标准加以证实，而科学的严密性不过就是价值判断。尽管这样，实际上经济学家仍要犯错误不受价值观念影响的经济学至少在原则上是可能的，同时，说“不受价值观念影响的经济学”的意思只是说经济学家能够区别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他们研究的经济代理人或者他们指导的决策化的价值判断，本书以下分章将提供很多证据表明一个论据能够根据任何公开宣称的价值判断进行评价，不受人们是否会意这个判断。

教育经济学只是任何教育问题的叙述的一部分，必须吸收教育研究和教育社会学的内容，甚至教育史也是极具有关系的。这不是一个学科正确，其他学科错误的问题，也不是有此学科比其他学科更加重要的问题，在不同的社会科学中问“自己话也让别人话”的基本方法论规则，没有一个地方能比教育领域中表现的更突出。事实上，没有学习很多有关，学校教育的多重结果的邻近学科，就不能在教育经济学方面成功。

## 第一章 人力资本的形成

### 人力资本：隐喻还是类比？

在所有我们了解的经济部门，受教育较多的人的平均收入高于受教育较少的人，至少比较同年龄的人是这样。换言之，多受教育，一生收入增加。我们将在第二章证实这个事实，但是我们暂且承认它是确认的。就在这个极其简单的意义上，如个人为获得更多的教育而付出的成本构成他们自己未来挣钱能力的投资。

但是，学生在法定离校年龄之后继续留校学习，这不是主要理由吗？当我们决定获取普通水平证书或高级水平证书时，有人曾意识到一生收入前景吗？也许并不是。我们这样做不过是接受父母的劝告：“这将是一件好事”，或者不过是模仿我们的朋友，他们无疑得到他们父母类似的劝告。那么为什么我们父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要得到一个好的职业，需要更多的教育”。译成经济学家的语言就是：因为现在教育是一种有利可图的私人投资”。我们无需假定完全有意识的动机或者充分理解按年龄和教育资历的工资收入的分配。我们也无需不顾继续留校学习的所有其它动机。所要求的是这样一个思想，即受过教育的人的较高的收入乃是对教育的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

即便多受教育并不提高一生的收入，从社会观点来看，教育总还是一种投资，如未发展中的经济要求不断提供受教育高深的人力，国家会鼓励学生留校学习，作为对全体人口未来生产能力的一种投资的方法。这里并不涉及动机的问题，因为按定义说，

个人目前并不分享提高生产能力的成果，至少和他们个人所受教育的程度不成比例。但是，教育仍旧是一种投资，不是为个人而是为整个社会。

所有这一切都是足够明白的，但是，它对经济行为的含义直到最近并没有被人真正理解。由于这一个基本思想，那一个受教育的人是一件花钱的机器，远在二百年前在经济学的渊源《国富论》中就已提出，这就更令人惊奇了，亚当·斯密说过：

在制造任何花钱的机器时，必须期望在机器破旧以前所完成的非凡的工作，将偿还对机器的投资，至少再加通常的利润。花很大的劳力和时间教育一个人，担任任何要求非凡的技巧和技能的工作，可以和花钱的机器比较。必须期望他超过普通劳动力的通常工资所完成的工作，将偿还全部教育费用，至少再加同等价值的资本的通常利润，必须考虑人类生命年期不定，还要求和机器的比较确定的年期同样在适当的时间内偿还。熟练劳动力和普通劳动力的工资的差别就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斯密《国富论》1776年出版，第一卷，第十章，第一编）

在这么一个有希望的开端以后，为什么教育的投资方面事实上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前半页几乎完全为经济学家所忽视呢？在经济史上对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马歇尔所著《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扼杀了在正统的经济学的主流以外已经逐步发展起来的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马歇尔拒不承认“人力资本”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是不现实的，他们一代宗师的威信与这个概念的消失有关。但是，事实上，马歇尔所反对的是把人们获得的技能包括在“财富”和“资本”的计量之内，他接受斯密关于一个受教育的人可以和一件花钱的机器比拟的建议。

所有剑桥学派经济学家的读者都知道，在经济学中，凡是马歇尔所没有讲过的话都不值得讲。的确，在这个问题上，马歇尔的话特别耐人寻味。当然，马歇尔的著作发表在《国富论》之后一个多世纪，关于市场力量在所有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效益之间确实平等的思想，这不及斯密那么肯定。十九世纪一系列立法使他习惯于国家补助教育的思想，他深信：

用国家和私人的资金兴办教育，这种明智的举动，不是单从它的直接的结果所能计量的，仅仅作为投资，将是有利的，使广大群众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利用。因为，通过这种方法，很多人本来只是默默无闻地死去，都能开始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高等教育向群众开放，如果能多培养出一个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在很多年内所花的费用就可以完全偿还。（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年出版，第四卷，第六章，第七节）(1)

总之，只要受教育的财政手段分配不均，必然出现某种意义上的教育投资不足。马歇尔接着说：“经济学家对很少实际问题比对与儿童教育应由国家和家长分担的原则有关的问题具有更为直接的兴趣”。要是他阐明的那些原则，现在大家知道的“教育经济学”这门学科早在1890年就已诞生，而不要等到1960年左右，但是他不是这样做，却突然转向别的主题。

二十五章以后，他在讨论导致劳动市场工人讨价还价地位的不利条件时又回到这个问题。他的评论值得详细引述，因为它们说明斯密原理的进一步发展，在教育的需求中有投资的动机。

---

(1) 这些例子选得不好：莎士比亚和贝多芬没有享受到高等教育的好处。——原注。

我们应该注意的第一点是这样的事实，生产中的人力不是象机器和生产中的其他物力所能买卖的。工人出卖他的劳力，但是他仍然是他自己的财产：那些负担养育和教育他的费用的人得到很少日后为他服务所支付的代价。……竞争往往把设立工厂和制造蒸汽机交给愿意而且能够承担一切费用者之手，这种费用将增加其作为生产力的价值。但是，英国工人用于育养子女的投资则受到社会各阶层父母财力的多寡，他们预测未来能力的高低，以及为其子女而牺牲自己的意愿的大小的限制。

对比较高的工业阶层来说，弊病还是很大。因为，他们多数人对未来认识清楚，对此兴趣不高。他们竭力为他们的子弟选择最好的职业，并为这些职业选择最好的训练；同时他们一般都愿意并能够承担相当大的费用。特别是高级专业阶层，虽然一般热切为他们子女积储一些资本，但是更加注意在子女身上进行投资的机会。只要在高级工业阶层出现任何要求额外专门教育的新的职位，未来的所得不必比目前的费用高得很好，就会对这一职位引起剧烈的竞争。

但是在社会的下层，弊病就很大。因为家长收入菲薄，教育程度不高，对未来能力比较薄弱，他们对子女教育和训练的投资不如对改进任何完善的机器的投资那样放手和大胆。但是我们现在应特别强调问题是这种弊病是积累性的。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年版，第六卷，第四章，第二节）。

换言之，可以这样说：一个人的教育费用构成对未来挣钱能力的投资，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所以，正如亚当·斯密正确地注意到，受过教育的人往往比缺乏教育的人挣的钱多，这不是

偶然的：要是不能从教育中得到和“同等价值的资本的普通利润”大致相等的金钱收益，受过教育的人的采源将会很快枯竭。但是，个人并不能把他们的挣钱能力变为资本，这个事实表明，受教育决定可能包含与有意识地收益与成本比例平衡无关的种种考虑。

在非奴隶社会，个人是他自己的财产，这种财产是不可剥夺的，他对服务没有留置权，或者签订了强制性的为将来相当长时间内服务的协议。因此，和奴隶社会缺乏未来挣钱能力的权利得以进行交换的资本市场或挣钱能力的可能用作借贷教育经费，间接的目的的附属担保。当然，原则上，在这种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防止任何人做出使不可剥夺的权利变为资本并相应地进行借贷的姿态；但是，如果不进行交易，价值的计量就变成专断的，因而贷方不愿承担义务。所以，实际上，一个人有效地受到他父母的财产或慈善机关的不确定的仁慈的限制；这样，一代人成员之间收入的不平等在下一代的成员之间永远存在下去甚至更为加剧。

马歇尔完全熟悉赞舍有关 (Iuing hrshu)，“资本”的定义仅仅指在一定时刻，在一段时间产生一系列服务的任何现在有存量，所以，“收入”的流量乃是某项“资本”的产物，“资本”的价值使收入流量以适当的折扣变为资本来计算。他承认“赞舍教反的著作包含高明的论据，有丰富的启示作用，赞成全面的资本”一词。但是，他的结论却说“赞舍似乎太少考虑体现现实的讨论联系市场的语言的需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年版附录成，第二节），归根到底，马歇尔赞成当时比较传统的定义，不把人们的技能作为资本存量的组成部分或经济“的财富”，但是，虽然他不在定义上说明，他在用教育来分析改

善劳动力质量的因果时，还是用资本积累的比喻，在他著作的最后几章，概括他关于“分配的一般观点”时，他再次提到投资的比喻：

工资和努力的其它所得与资本的利息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支配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供应价格的原因大体一致，诱使一个人在他儿子教育上积累人力资本的动机与控制为他儿子积累物力资本的动机是相似的。一个父亲从工作着和等待着以便传给他儿子富裕的和稳固的制造业和商业，不断地转变到工作着和等待着，支持他缓慢地受着完善的医学教育的儿子，最终为他买到一项有利的职业。还有一种同样不断的转变，就是转变到工作着和等待着以便他的儿子可以留在学校，使他儿子以后能工作一些时间几乎不算工作而学会一种熟练的行业，而不是很早就业，例如当一个侍僮以供养自己，这种职业将来不会有何长进，却给孩子较高的工资。

的确，象现在这样的社会，唯一可能投资很多以开发青年人的个人资本的人乃是他的父母；很多第一流的才能没有得到培养，因为那些有能力开发这种才能的人，没有一个人有何特殊兴趣去开发它。这个事实在实践上非常重要，因为它的影响是累积性的。但是它并不引起生产的物力和人力之间的根本区别……，总的看来，雇定任何劳动力的所花的金钱长远来看和生产劳动力的真正成本是相符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年版，第六卷，第十一章，第一节）。

教育投资的决定是父母为他们子女作的，而不是子女自己作的，这个事实“并不发生生产的物力与人力之间的根本区别”。很清楚，这是对我们可能找到的关于人力资本形成的概念强有力

的支持。当然，一切要看“根本区别”是什么含义，但是很难理解多数对马歇尔的评论家们怎么会对他作出错误的解释（计克尔：《人力资本概念的历史根源》（1966）；沙弗尔《评人力资本的投资》（1961），说他主张教育开支不应从我们通常用于生产者的耐久设备的开支，同样的投资估价技术。(1)

在这里，我们目的既在于纠正经济思想史中的是非曲直，也不在于借显示经济理论的古代思想根源，而教育它们的威信；在马歇尔以前和以后没有解决忽略人力资本的概念的秘密有待别人去探索，相反，我的目的在于表明亚当·斯密关于教育和训练可以看作“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形式的理论构成一个科研的课题，而不是宣布一个无可争异的见解，不管是在1890年还是1970年。

近代经济缺乏“劳动力的资本市场”，奴隶解放必然意味着人并不象资本货物是正式的生产工具，这是完全正确的。资本市场终究不过是收入变成资本和资本变成收入的市场，换言之，把多次未支付可能变成一次预支变成多次未来支付。因为，非奴隶制社会禁止人们订立未来服务的契约，“自由的”人民必须把他们的人类财富专作劳动服务的形式，不能防止未来服务的需求的无法预见的变化。但是甚至“自由的”人民有时出卖他们的权利给未来的劳动服务：这种伪装出卖的典型例子是专业运动员和足

---

(1)：对马歇尔的解译强烈反对意见，参阅布朗迪《评马歇尔人力资本》载1967年12月《政治经济学杂志》；计克尔：《评马歇尔人力资本论》，1968年九月/十日《政治经济学杂志》。

——原注。



球俱乐部或棒球俱乐部签约全部为俱乐部打球而接受“津贴”和受欢迎的表演者订立专门的公约，工作若干年，交换一笔资金。此外，抵押贷款典型性地反映借方的挣钱能力：在稳定的职业收入比教育的人通常比较容易借到钱买房子。同样，当人们保险以免因死或伤残而损失未来收入时，他们所买的保险额往往等于他们有生之年所能挣到的钱的目前的资本值。虽然迄今为止，自由社会的教育一般都由慈善团体，国家或家庭给学生的馈赠作资金，近来在一些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出现的学生贷款计划表明象人力资本市场的东西可以通过周密的政策行为进行创造。所有这些考虑表明缺乏劳动力的资本市场与其说是“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性质的差异，不如说是程度的差异，没有劳动力资本市场，仅仅表明人力资本的资本形成无需达到未来收资的打了折扣的价值与成本相等的地步（这种行话以后将有解释），但这不一定驳倒国际平衡的趋势的思想。换句话说，把教育的训练的需求看作适合未来一生收益的投资需求，可能是有益的，从成本和收益的金钱方面的计算通过教育和训练劳动质量的提高，可能是有启发性的。这种“好象怎么怎么”的假设的证明在于实践。只有通过提出有关教育如训练的具向我们才能评价人力资本方法的效度。